

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格局与问题^{*}

赵伟 严浩坤

内容提要 本文以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出发点,就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最新进程、基本格局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基于对各种权威数据的比较、分析,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实际发生的对外投资,要大大多于官方统计数据;基于对这些投资的产业、地域、企业类型等五个指标的分析,文章勾勒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本格局;基于大量实证研究,文章将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五大类型。

关键词 “走出去” 对外直接投资

作者赵伟,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严浩坤,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财经学院财金系教师。(杭州 310027)

“走出去”战略是中央政府在世纪转折时期提出来的,这个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样,属于国家战略。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为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发展拓展国际空间。“走出去”的微观主体是企业,国家战略的实现最终有赖于企业的“走出去”行动。时隔数年,我国企业“走出去”进程如何,遇到哪些问题?这显然是值得跟踪研究的问题。

一、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

客观地说,企业“走出去”的核心内容不外乎二:其一是跨国投资,其二是跨国经营。一般情况下,企业跨国经营以投资为前提,跨国投资则以经营活动

为基础。因此可以将企业跨国投资,作为判断我国企业“走出去”进程的基本线索。按照这个线索,对于我国企业“走出去”进程的把握,首先涉及到投资规模的判断。这个问题,也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目前关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规模,至少有三个权威数据可以利用:

第一个是国家原外经贸部的统计数据。按照原外经贸部统计,截至2002年底,中国累计设立境外非金融类企业6960家,协议投资总额137.8亿美元,中方投资额93.4亿美元。

第二个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该机构统计显示,我国在1980年代初期即已有少量对外直接

* 本文为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委托课题——《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思路与政策建议》研究成果之一。

为经济学界的鲶鱼,搅得大家不得安生。学界有这种“鲶鱼”能激发人们的思考,促进更深入的研究,无疑不是坏事。三人谈的一席话传递了很有意思的学术信息。即便是我认为有漏洞的看法,如果能激起讨论,也是一种学术贡献。总之,接下来不是丁、卫东、叶航忙乎,学界同仁也要跟着忙乎了。

2003年10月28日

注释:

Trsten Persson & Guido Tabellini, Political Economics, explaining Economic Policy, The MIT Press, 2002.

Gene M. Grossman & Elhanan Helpman, Special Interest Policies, The MIT Press,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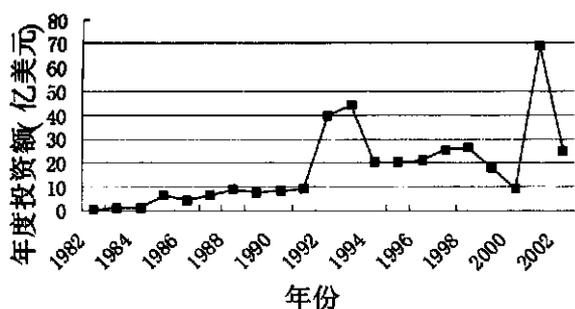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董希望

投资,年度投资额在 5 千万美元以下;80 年代后期已初具规模,年度投资在 4~9 亿美元之间,90 年代后增长较快,且起伏较大,多数年份在 20 亿美元以上。若将该机构公布的统计数据加总,则从 1982 年到 2002 年,我国累计发生的境外直接投资,当不少于 370 亿美元(参见表 1 和图一)。

表 1 1982~2002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亿美元)

年份	投资额	年份	投资额	年份	投资额	年份	投资额
1982	0.44	1988	8.5	1994	20	2000	9.2
1983	0.93	1989	7.8	1995	20	2001	68.9
1984	1.34	1990	8.3	1996	21.1	2002	25.18
1985	6.29	1991	9.1	1997	25.6		
1986	4.5	1992	40	1998	26.3		
1987	6.45	1993	44	1999	17.7	总计	371.63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历年公布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图一 1982 年至 2002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

注:本图根据表 1 的数据绘制。

第三个是权威国际经济组织的数据。UNCTAD(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 年《世界投资报告》宣称,到 2000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 272 亿美元。UNCTAD 的《2002 年统计手册》估计,2001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约是 17.75 亿美元。因此,根据 UNCTAD(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截止 2001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约为 290 亿美元。据此可推测,截止 2002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大约在 310 至 320 亿美元之间。

客观地分析,在上述三个数据中,原外经贸部数据只反映了经主管部门批准或备案过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额,而未反映未经官方批准的投资,其统计口径最小;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不仅反映了经官方批准的企业经营性投资,而且还包括了相当的政府非经营性投资,其口径最大。但无论前

者还是后者,均未反映未经政府批准的企业与私人对外投资。UNCTAD 的数据主要是根据中国政府申报数据,剔除其中的非经营性投资部分,考虑国际直接投资流动总额与区域分布态势,由国际权威研究机构推算出来的。相对而言,它考虑了未经政府批准的对外投资,因此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

我们认为,要准确地计算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实际规模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将上述机构数据作为基本依据,同时考虑如下三对变量之间的联系,推算出一个接近实际的数据:

其一是批准协议投资与这些协议下实际发生投资之间的联系。中国引进外资方面的一个倾向是,协议投资往往大于实际投资,但在中国对外投资方面,普遍倾向则是,实际发生的投资大于协议投资。

其二是经政府批准的投资与未经政府批准的企业与私人对外投资之间的联系。客观地说,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对外投资,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投资,而无论是基层管理部门的估计,还是国内外专家的研究,都得出结论:中国未经官方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要远大于经批准的投资。

其三是,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持续存在的巨额的“净误差与遗漏”与未经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联系。统计数据显示,从 1991 年到 2001 年,该数额累积高达“-1250”亿美元(参见表 2),其中相当部分与非正规渠道资本外流有关。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造成净误差与遗漏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统计误差,另一是资本外逃。在我国,应该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绕过政府批准限制门槛的对外投资,包括直接投资。

表 2 1982~2001 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亿美元)

年份	净误差与遗漏	年份	净误差与遗漏	年份	净误差与遗漏	年份	净误差与遗漏
1982	2.79	1987	-13.7	1992	-82.5	1997	-169.5
1983	1.17	1988	-10.1	1993	-17.7	1998	-165.8
1984	-9.32	1989	0.9	1994	-97.8	1999	-148
1985	0.92	1990	-31.3	1995	-178.1	2000	-118.9
1986	-8.63	1991	-67.5	1996	-155.7	2001	-48.6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历年公布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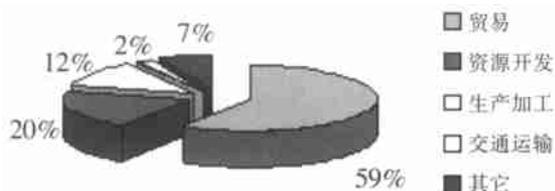
支平衡表》。

按照上述思路,我们推算的结论是:原外经贸部数据,大约只反映了中国实际发生的投资额的1/4。按此推算,截止2002年,中国实际发生的对外直接投资,约为375亿美元左右。这个数额大体上与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一致,略大于UNCTAD数据。

二、中国企业“走出去”格局

关于我国企业“走出去”格局,大体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予以判断:

第一是投资的产业、行业分布。我国对外投资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承包工程、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医疗卫生、旅游餐饮及咨询服务等多个领域。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按照投资金额比例划分,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业分布的大体态势是:大部分投资集中于贸易领域,绝大部分投资集中于贸易和资源开发领域。具体来说,海外贸易型机构投资占总投资的近60%,加上资源开发型投资,则占总投资的80%以上。各行业分布比重依次为:贸易占59%,资源开发占20%,生产加工占12%,交通运输占2%左右,其他占7%左右(参见图二)。由此可见,在中国境外投资中,第一产业约占20%,第二产业约占15%,第三产业约占65%。尽管第三产业投资比重较大,但是其中贸易型投资项目占据绝大比重,其他投资项目也是一些较低层次的三产行业。例如旅游餐饮等。



图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示意图

上述数据,也仅是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备案的投资,至于未报政府审批的民间自发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难以准确判断,但根据典型案例分析,这类投资的大部分,属于贸易型企业投资,生产、加工型投资比重不大。

第二是投资的全球区域分布。到2001年,经批准的海外投资非贸易型企业3091个,投资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投资的全球区域

分布,大体有三个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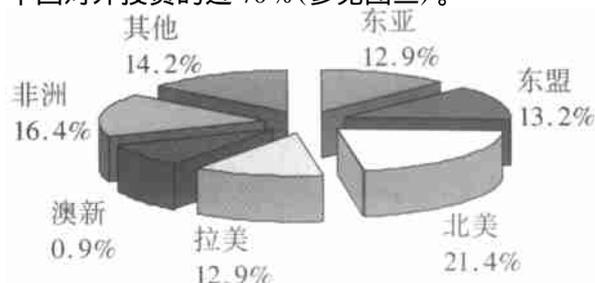
(1)按照投资接受方经济发展层次划分,投资最多当属发达工业化国家,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的投资就占我国全部海外投资的30%;其次为新兴NIES(新兴工业化经济),这两类经济投资占总额的比重在60%以上(参见表3)。

表3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域分布(截止2001年,非贸易型投资额)

地区	东亚	东盟	北美	拉美	澳新	独联体	欧盟	非洲	其他
比重(%)	12.9	13.2	21.4	12.9	9.0	5.1	1.6	16.4	7.5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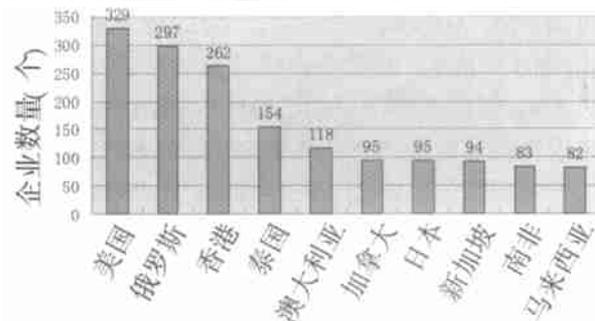
(2)按照投资额大区域分布计算,绝大部分投资位于亚太地区。在亚太地区投资份额依次为北美、东盟、东亚、拉美与澳新,整个亚太地区占中国对外投资的近70%(参见图三)。



图三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域分布(截止2001年,非贸易型投资额)

注:根据表3的数据绘制。

(3)按照企业数量全球分布,我国多半非贸易型企业设在10个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美国、俄罗斯、香港地区、泰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日本、南非和马来西亚,总共有经政府批准的非贸易型中资企业1609家(参见图四),占全部海外非贸易型企业数量的52.05%。



图四 中国海外企业数量最多的10个国家与地区(截止2001年,非贸易型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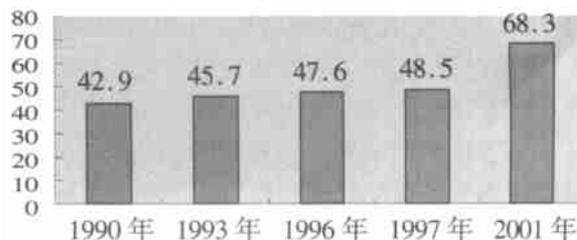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2002》。

上述投资全球分布在产业上具有一定区域集中特征。其中资源开发型投资主要集中在拉美、非洲、澳大利亚等资源丰裕的地区和国家,大约 32% 的加工制造业投资在非洲、20% 左右在东南亚(主要是越、柬、老三国)、拉美约有 18%,还有一些在东欧、中亚等发展层次较低的地区与国家。由此可见,我国在加工制造业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是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这与我国的加工制造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有关系。上海市的数据是,对外投资初级加工制造业的 50% 左右,位于非洲与拉美。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投资于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几乎所有大型家电企业,如海尔、科龙、TCL、小天鹅、海信、康佳等,都在美国或日本建有研发基地,而信息产业的代表性企业如联想、四通亦在美国、香港设有带研发特征的机构。

第三是投资主体的结构。有关分析揭示,若抛开金融、保险业的海外投资(这类海外投资主体一般是国有银行与保险公司)不计,则中国企业跨国投资主体可以分为四大类:(1)专业外贸公司,以国有大型或垄断性贸易集团为主。代表性企业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等等。(2)生产性企业或企业集团,以国有或股份制大型企业为龙头,如首钢、海尔、科龙、春兰、康佳等企业,都有一定规模的海外投资。(3)运输及建筑工程企业,也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代表性企业有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土木工程公司、中国水利电力总公司等。(4)中小型企业。这类企业所有制从国有到非国有,从公有到私营跨度较大,投资规模小,经营领域单一。

第四是投资方式结构。按海外投资经营方式,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可以划分为独资子公司、海外分公司(或分支机构)、海外合资经营企业以及合作经营企业等四种类型。就投资性质与投资方式的关系来看,一般而言,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在境外举办的生产性项目绝大多数采取的是与东道国或第三国的企业合资、合作经营的方式;贸易性企业则主要采取中方独资的方式;境外资源开发,尤其是石油勘探开发项目主要采取国际上惯用的合作

开发的方式;在香港的中资企业则有不少采取了由中方控股的股份制上市公司的方式。整体看来,我国海外投资的最主要方式是东道国政府或企业设立合资企业,约占生产型投资的 70%,其次为我方独资经营的企业,约占总投资的 20%,只有 10% 左右的投资,属于其他两种类型的投资。在我国的非贸易型境外企业中,独资企业所占比重逐步提高,合资企业中我方投资比例也有扩大的趋势(参见图五)。1990 年,中方投资占协议投资总额的 42.9%,1993 年提高到 45.7%,96 年提高到 47.6%,97 年为 48.5%,到 2001 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 68.29%。另据统计,中国境外投资项目约有 85% 属于新建项目,通过收购、控股、参股等方式设立的企业比重很低,约占 15%,而且大多集中在香港地区;而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其绝大多数是通过兼并、收购方式来实现的。近来我国有一些大型企业借助国际并购浪潮,通过跨国购并形式实现海外投资。2001 年,中海油以 5.85 亿美元收购西班牙瑞普索公司在印尼油田的部分股权,颇具典型意义。除此之外,我国也有少数企业的境外投资采取了 BOT 等项目融资方式。



图五 中方投资额占协议投资额的比重 (%)

注:这几个数据是根据历年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来的。

第五是企业经营状况与投资效益。总体上来分析,我国海外企业经营范围主要以贸易型和资源开发型为主,多数贸易型企业带有某种“窗口”、“夫妻店”加“接待站”的特征,经营效益差。有研究认为,中国海外企业中,盈利的占 55%,收支勉强平衡的占 28%,亏损企业占 17%。按照经营产业、行业来看,赢利企业多为非生产性的,而亏损企业则以生产性居多;按照企业所有权关系来分析,赢利企业多为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项目成功概率并不高。按照是否经政府批准来看,经官方批准的尤其是由官方参与的

投资,成功率较低。有关调查显示,沿海典型地区过半数的企业海外投资是不成功的,真正成功的企业仅占10%左右。

三、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这个进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按照问题产生的原因,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

第一类问题与“走出去”企业内部产权制度、管理体制缺陷联系在一起。其中内部产权制度引出的问题在国有或集体企业海外投资中最多。由于内部产权不清晰,缺乏激励机制,致使企业对外投资夭折或亏损;由于海外企业与国内投资者之间产权的连带,国内项目失败导致国外项目缺乏后续投资而夭折。诸如此类事例,屡屡发生。管理体制弊端引出的问题,在国有与非国有对外投资企业中均存在,但相比较而言,非国有企业比较突出。而多数非国有企业规模小,缺乏对外经济交往的人才与经验。

第二类问题与“走出去”企业—政府主管部门关系方面存在缺陷联系在一起。这类问题主要有四:(1)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海外投资缺乏有效协调与管理。政府在企业资金地区投向和产业投向上,既缺乏总体战略,也缺乏政策引导,企业海外投资随意性较大。海外投资管理多头,各部门一般从各自管辖的权限和部门管理目的出发,各自为政式地履行各自的管理权限,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协调,致使某些监管业务重复与遗漏并存。(2)审批制度僵化,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企业的跨国投资与经营活动。由于实行“逐级审批,限额管理”的体制,对企业投资限制多于激励。加上银行信贷、外汇管制、海关监管等环节,一个项目,从考察、立项、审批,到筹备、投资、建设,耗时旷日持久,导致投资项目错过市场时机而失败。由于审批制度僵化,许多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则想方设法绕过此种制度限制,贸然进军海外。(3)对外投资后期监管低效与不力。世界银行在其199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2020年的中国》就曾指出:中国对外投资“潜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缺少对外投资的适当监管。国家资金有时被浪费到不适当的项目;根据一些报告,三分之一的中国对外投资是亏损的。”浙江省杭州市外经贸部门的有关调研揭示,该市经政

府批准的海外投资中,不成功的企业比重高达54.7%,真正成功的企业比重占10%强。投资失败的主要原因与政府对于国有机构投资的监管乏力有关;(4)鼓励与扶持企业对外投资的优惠政策缺乏可操作性。有的优惠政策申报程序复杂,有的优惠政策的实施牵扯多个部门,执行难度大。

第三类问题属于企业“走出去”所需法律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二:(1)有关立法严重滞后,存在以主观部门规定、行政法规代替国家法律的倾向。迄今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企业海外投资与经营法,有的只是主管部门颁布的行政性法规。1979年迄今,各涉外主管部门先后出台的此类行政法规,不下6部。计有外经贸部《关于在国外开设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198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1989年)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1990年),国有资产管理局《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1992年),国有资产管理局、外经贸部及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关于用国有资产实物向境外投入开办企业的有关规定》(1993年),以及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意见的通知》(1999年)。这些法规全由行政主管部门发布,属于行政法规,不具国家法规地位,在企业对外投资事前审批环节具有很大权威性,但在事后监管环节则显得乏力。即使如此,由于政出多门,各种行政法规间的配套性较差,加大了实施难度。(2)双边及多边国际投资协定滞后。虽然我国迄今已签署了不少有关投资保障及避免双重征税的双边协定,但与不少国家、地区的协定尚未签署。目前与我国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与地区才100个出头,签订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与地区60多个,分别占同我国有贸易投资往来国家和地区总数的大约60%和40%。这些协定大多数是中国以投资东道国的身份签署,而非以投资输出国身份签署,因此,对我国在海外投资的保护作用不可高估。缺乏双边协定的有力保障,无疑增加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

第四类问题属于企业“走出去”民间非政府支撑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一般市场经济国家,

企业跨国投资得益于健全的非政府支持体系。这个体系由各种非政府机构与系统组成,包括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融资服务、信贷担保的跨国银行与证券公司,提供保险服务的保险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审计、评估等机构,调查与信息中介服务中介机构,以及行业协会、同业工会、商会等等。相比较来看,我国企业“走出去”则缺乏此类支撑体系。其中最急需的是如下机构:(1)熟悉跨国投资业务的投资中介机构。(2)熟悉国际投资规则、法律同时精通外语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审计事务机构。(3)可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信息服务与资讯评估的中介机构。(4)保护投资者、产业、行业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等等。这些组织迄今在国内业务中尚未形成气候,更谈不上涉外业务了。

第五类属于企业“走出去”引致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问题。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投资和经营,必然会引起国内外汇市场、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加强,而伴随着这两个市场的国际化及其运转速度的加快,国家有关机构的监管难度必然增大。在此情况下,任何监管滞后或监管不力,都可能为国际投机者与国内腐败分子所利用,由此而给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造成隐患。就我国企业目前“走出去”进程来看,已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三个问题首先值得予以关注:(1)正常的海外投资与资本外逃混在一起,加大了监管难度。目前多数私营企业、尤其是个人的海外投资,都不同程度地绕开了政府审批,因而位于国内金融机构的监管视野之外。(2)正常的外汇兑换与非法的套汇业务混淆在一起,加大了外汇市场的不稳定性。(3)正常的企业海外投资、经营与带有腐败背景的交易混淆在一起,加大了国有资产流失风险。

注释:

国内外一些学者和机构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之一,是我国实际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要远远高于官方统计数据。例如,英国学者 David Wall 的研究表明,仅仅在香港,

到 1996 年底,大陆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 400 亿美元(参考文献[7])。又如 IMF 认为,仅仅是 1989~1995 年期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 1000 亿美元,其中 500 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参考文献[6])。

这几个数字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table/jjhzjt/2002-22.html>。

比如,温州市外经贸委早先的一份汇报材料称:截止 2000 年 5 月份,该市经国家批准的境外机构 36 家,总投资近 800 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 600 万美元;未经政府批准而由企业自行设立的境外机构 60~70 家,其投资额可能更大。

这几个数字引自参考文献[1]。

这几个数字引自参考文献[5]。

“寻找中国的跨国公司”,新华网(2002-04-19 16:55:05)。稿件来源:《中国经营报》。

参考文献:

1. 赵伟:《浙江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与政策措施》,研究报告,浙江省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2000年。
2. 赵伟:“浙江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比较优势与规模预期”,《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3.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2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年版。
4. 外经贸部国外经济合作司:《2002年国外经济合作简明统计》,二〇〇三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www.mofcom.gov.cn)。
5. 尹建桥、柳爱民:“论我国的境外投资股权模式”,《重庆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6. 齐春宇:“中国大陆对外直接投资的状况和动因:香港个案”,《亚太经济》1999年第2期。
7. 江小涓:“‘十五’我国对外投资趋势研究:全球背景、投资规模与重点选择”,《管理世界》2001年第1期。
8. UNCTAD(2001),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 New York: U. N.
9. UNCTAD(2002),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2, New York: U. N.
10. UNCTAD(2002), 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02, New York: U. N.

责任编辑 董希望